

生命经济：持续经济增长的新路径

郭 晔

(厦门大学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本文从“可持续增长”的视角,以“福利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阐述了“生命经济”的内涵与外延,提出了当前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路径——发展“生命经济”,更确切地说是以“人的生命”为本替代以“资”为本发展经济。

关键词: 生命经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892 (2006) 06-0009-04

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信息经济……人类在不断的理念与技术变革中经历着经济发展核心形态的变迁(图1所示)。但是,至今世界各国都在反思过去的经济发展理念与模式,寻找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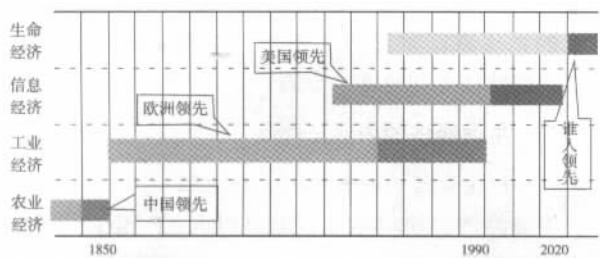


图1 世界经济核心形态的历史演进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基于沿海地区的、以出口为导向的、以制造业为重心的经济增长策略在中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然而,在我们欢欣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又不得不意识到GDP数据背后暴露出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雷同、投资盲目、消费乏力等致命弱点,同时,资源在一轮轮的快速增长中被消耗,社会总福利增长缓慢。种种事实表明,中国经济将可能遭遇增长困境。于是,“转换增长空间、变迁增长模式”成为突破这种困境的唯一路径。鉴于此,我们提出并论证“生命经济”的概念与内涵,为可持续经济发展提供转换增长空间的新思路。

一、生命经济的理论依据——经济增长涵义的重释与幸福经济学

(一) 衡量“经济增长”从实际GDP到“幸福”指数

依据《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经济增长”最普遍的定义与衡量标准是以固定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的某种度量的变化率。由此,研究经济增长应用最

广泛的概念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即实际GDP,或者用人口变动影响调整的人均实际GDP。

然而,这种经济增长的定义和衡量标准已经遭到许多批评,诸如绿色GDP、经济福利的度量等评价指标被提出。归结起来,这些批评意见的实质是相同的,即都是对传统“经济增长”涵义的质疑。传统上以实际GDP变化为基础的衡量,是将“经济增长”的涵义狭义为经济生产能力的某些方面的增长,并且纯粹以“量”来衡量,而诸如社会公正、个人寿命、精神快乐等内涵于社会福利的非经济方面的生活质量因素则被全然忽略,增长在“质”的方面没有衡量。可以说,传统的经济增长涵义仅反映了经济福利的内容,而且实际GDP也没有完全概括经济福利,充其量仅是反映经济福利的某些方面而已,更为不足的是,实际GDP的度量中尚存在重大缺陷,如环境污染、闲暇时间的丧失等成本与经济增长直接关联,但在实际GDP中这些因素并未予以扣除等。

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之一,福利经济学是以最大化社会福利为目标而展开分析的一类经济学理论。它力图依据社会福利的高低来评价与分析社会中的不同经济状况,从而探索如何最大化社会福利。福利经济学将社会福利看作是个人福利的向量加总,而且将个人福利以“幸福”(well being 或“效用”(utility)来表示。^[1]因此,经济增长将由传统的对实际GDP变化率的衡量转变为对“幸福”指数变化程度的衡量。

(二) “幸福”:“效用”涵义的回归

福利经济学将个人福利看作是个人幸福,更确切地说,是个人的快乐。所谓“幸福(或快乐)”是以物质存在和消费为基础又超然于物质存在和消费之上的一种主观精神感受。幸福或快乐的有无可以归结为

收稿日期: 2006-02-25

作者简介: 郭 晔,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厦门大学金融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金融制度。

肉体上的愉快和痛苦，但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愉快和痛苦。可以认为，人们的一切行为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各自精神上的快乐满足，无所不包的人类行为均在一定的精神快乐需要支配下而产生，均为实现一定的快乐满足而展开。这又被称为人类行为的快乐原则。^[2]

“幸福”的涵义可以追溯到最早的“效用”概念。最早的“效用”概念由功利主义哲学领域提出，具有三层含义：其一，效用即代表快乐和享乐指数；其二，每个人都争取使这种指数越高越好；其三，随着个人的收入增加，其收入在边际上的效用少了。此外，与之相应的还存在一套“快乐计算学”，即认为人们快乐（或痛苦）的衡量主要由以下几种因素决定：强度（intensity）、延续时间（duration）、确定性（certainty or uncertainty）、作用远近（propinquity or remoteness）、后续性（fecundity）、纯度（purity）、作用范围（extent）等。^[3]然而，随着“经济学帝国”向哲学、社会学等各领域的渗透，“效用”涵义逐渐脱离了早期效用的内涵，而渐渐转变成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用”概念，由快乐指数变成为偏好的满足。“快乐”由“满足”代替，“痛苦”由“损害”代替，效用变成一个仅仅表示对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的指标，成为一个满足指数。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用，似乎更多地是关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

鉴于此，幸福经济学的出现使得具有哲学意义的“幸福”概念被重新强调性地提出，令“效用”涵义完成了一次哲学、心理学意义上的回归。同时，幸福经济学认为“效用”是可测度的，即可以转化为测度人们的幸福感。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财富或经济利益的因素是决定人们幸福感的充分条件，但绝非必要条件。1974年，Richard Easterlin在他一篇开拓性的文章中提出：第一，快速的或一般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提高主观的幸福感，即使幸福和收入间代表性的关系是正向的；第二，就整个生命期间而言，一群人的平均主观幸福感是基本恒定的，但人们总是说他们过去不幸福，并期待未来更加幸福一些。^[4]

（三）幸福函数的不断扩展

在经济学意义上，以往的个人幸福或福利主要被视作是一个由个人的收入水平、财富状况决定的函数。^[5]然而，随着福利经济学理论以及实际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原有的幸福函数（或收入效用函数）已不足以解释人们的最优化行为，幸福函数已经并正在进行着不断的扩展：

$H=U(Y, W)$ ，其中H表示幸福感， $U(\cdot)$ 代表幸福

函数形式，Y表示收入，W表示财富状况

$\Rightarrow H=U(Y, W, S, A, M)$ ，其中S表示社会地位，A表示声誉，M表示婚姻状况

$\Rightarrow H=U(Y, W, S, A, M, F, E)$ ，其中F表示身体健康状况，E表示受教育程度

$\Rightarrow H=U(Y, W, S, A, M, F, E, P)$ ，其中P表示精神健康状况

$\Rightarrow \dots\dots$

幸福函数的不断扩展表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人们在不断地调整着自身感受幸福的方式，变换着对经济生活的偏好，社会福利的形式也由此不断发生变迁。在满足基本生存的物质需要后，人们日益注重生命价值和精神的需求，幸福指数的提高也依赖于收入和财富以外的因子不断扩展。今后，如果不能相应地调整经济的发展模式和方向，继续以过去的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是不能增加社会福利的，是不能推动社会和经济进步的。

二、生命经济的内涵与外延

（一）生命经济的基本概念和内涵

生命经济，简单地说，就是以人的“生命”为核心来研究经济，以人的“生命”为本来发展经济，并且围绕有益于提高人们的“生命质量”展开产业布局，寻求经济新型增长模式，使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

不难看出，生命经济的内涵是：其一，发展经济应该“以人的生命为本”为核心。其二，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衡量是以人们的经济福利是否增加为标准，更深入地看，人们的经济福利并非仅凭实际GDP指标来衡量，而是以更广义上的人们的幸福函数衡量。其三，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不断提升人们生命质量。其四，提升人们的生命质量包含两方面内容，即有效地延长人们生命长度和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其中，“有效地延长人们生命长度”并非仅指利用高新技术一味地延长人们的寿命，还包括延长人们愉悦的生命历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生命经济突出强调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强调人们在有限的生命长度内拥有尽可能高的幸福感受。对于提高物质生活质量是以往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心，而生命经济意在突破传统的经济增长理念，把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作为发展经济的重心之一，这是生命经济的创新所在。

依据以上生命经济的概念与内涵，可以归纳出生命经济所能包容的产业：表现于有效地延长人们的生

命长度方面，生态农业、生物制药、医疗保健、环境保护等产业属于生命经济的范畴；表现于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方面，教育文化、休闲旅游、娱乐等行业被囊括在生命经济的范围之内。至此，可将生命经济的基本概念结构总结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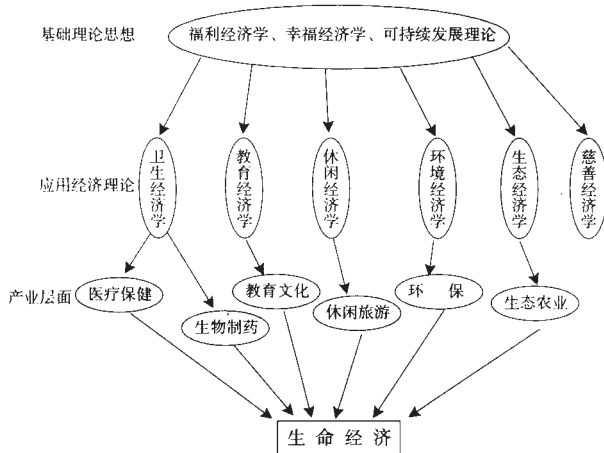


图2 生命经济的概念结构示意图

(二) 生命经济是三种经济形式的有机结合体

随着人们对经济增长、生活质量的重新认识，生物经济、绿色经济和体验经济都是与生命经济相近的提法。总的看来，无论是生物经济、绿色经济还是体验经济，均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重新诠释了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涵义，拓展了狭义地体现为实际GDP增长的经济增长观。生物经济主要从利用生物技术延长人的生命长度和改善人的生命状况的角度，为经济发展展现了新的动力；绿色经济主要是从环境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从而改善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体验经济则从人的感受出发，提出经济发展不仅是给人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商品和服务，更高层次的目标应是在此基础上给予人们精神上的愉悦感受并由此源源不断地产出经济价值。^[7]

尽管它们从各自的角度拓展了经济发展理念，然而它们都由于过分强调某一方面而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局限。“生命经济”概念不仅是三者一定程度上的有机结合，更突破了三者原有的局限。生命经济强调经济发展应着眼于延长人们的“生命长度”和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从而避免生物经济中由生物技术可能带来生化战争的尴尬，也没有如绿色经济那样过分强调保护环境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更吸取了体验经济的精髓，即强调针对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来选择经济增长模式。生命经济与三者的关系可以归纳为表1：

表1 生命经济与生物经济、绿色经济、体验经济的联系与区别

生命经济				
有效地延长人们的使用寿命			有益于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	
生物能源 / 芯片 / 国防 / 其它	生物制药 / 医疗保健 / 生态农业 / 其它	环保	教育、文化 / 休闲、旅游 / 其它	网络 / 赌博 / 毒品 / 其它
生物经济		绿色经济	体验经济	

三、生命经济的实质与微观实现机制

“生命经济”强调以人为本，更确切地说是围绕“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来发展经济，其实质是针对经济体内各微观主体不断扩展着的“幸福函数”，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模式。在相对贫穷的国家，人们的幸福函数中收入状况占据着绝对比重，并且可支配收入中满足基本温饱的食品和衣着方面的消费比重较大，生命经济缺乏发展的微观机制；而在相对富裕的国家，人们的幸福函数中身体健康状况、精神健康状况和教育程度等因子所占的比重会相对较大，生命经济具备微观实现机制。因此，生命经济是经济体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由经济体内微观主体的幸福函数演变至一定层次时新增的高层次需求所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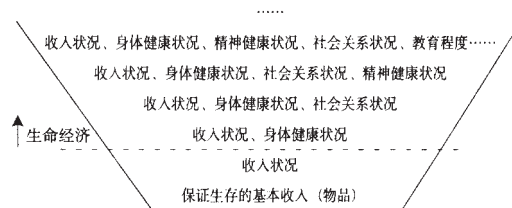


图3 微观主体的幸福函数（效用函数）梯型发展图

如图3所示，当人们的幸福函数从关注收入状况，转而同时关注身体健康状况、精神健康状况时，即进入了生命经济的初级阶段，并且随着人们幸福函数不断向上发展，生命经济的需求愈加强烈。于是，具体地分析生命经济的微观实现机制，关键在于必须以经济体内微观主体的行为作基础，把握经济体内一定阶段微观主体的幸福函数大致处于哪一层次。基本的生存需求满足之后的某个时期，生命经济开始启动，经济的增长点必然经历重大的变迁。

本文以我国居民消费者支出行为的数据为依据，从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的两类分组数据粗略地观察居民效用函数的层次状况。图4和图5中的1至8表示八个分组情况，它们依次是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讯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居住支出、杂项商品与服务支出。从图4中不难看出，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增幅领先的几项分别是第1、4、5、6组，即食品、医

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再进一步地观察，第一组食品支出、第二组衣着支出和第三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有一处共性：在1990年至1995年间出现一个很大的向上的飞跃之后，增幅趋缓；而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在1990年之后增幅均很大。这正论证了人们对生命经济的需求呈快速增长的趋势。

然而，在接下来的图5分析中，我们得到的结果却令人思考。与图4不同的是，图5是依据居民的“收入等级”来比较各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依据最低收入、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高收入和最高收入等八种收入等级在上述8组支出中的分布，可以大致得出四种分布状况：

其一，向下倾斜的分布曲线，即随着收入等级的增高在该组的支出比例趋低。这一类分布曲线只在第一组食品支出上表现，结论容易理解：收入越高的家庭支出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食品”上的部分越小。

其二，向上倾斜的分布曲线，即随着收入等级的增高在该组的支出比例趋高。多数组别严格地出现这种分布曲线，如第三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第五组交通通讯支出、第八组杂项商品与服务支出。

其三，出现抛物线状的分布曲线，即当收入等级达到中间一定状态时，在该组的支出份额达到最高（开口向下的抛物线）或最低（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前者表现在第二组衣着支出，中等收入家庭的衣着支出比例达到最大；后者表现在第七组居住支出，中等收入家庭的居住支出比例达到最小。

第四种分布状况是最特殊的，表现在第四组医疗保健和第六组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上，分布杂乱无章，依据收入等级的排列不呈明显的规律，特别是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恰恰这两组均属于生命经济领域。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各收入等级都对这两方面具有相似比重的需求；另一方面，经济中来自这两方面的供给较少、较粗糙，致使或对各收入等级的供给都相对稀缺，或不能根据各收入等级的不同偏好提供相应的供给。

从图4和图5的比较中可以得出结论：

第一，在我国，生命经济领域尚处于向上快速增长的初始启动阶段，各收入阶层对于“生命质量”出现平均上升的需求。而且，一方面各收入等级对于生命经济似乎具有相似的需求状况，另一方面生命经济领域的需求层次尚未充分开发，生命经济领域内的有效供给不足且缺乏精细，因此个性化和深层次地发展

生命经济各领域存有很大的空间，必须针对不同的收入阶层设计个性相异的生命经济产品，如医疗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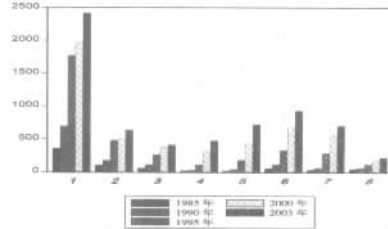


图4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分组构成年度比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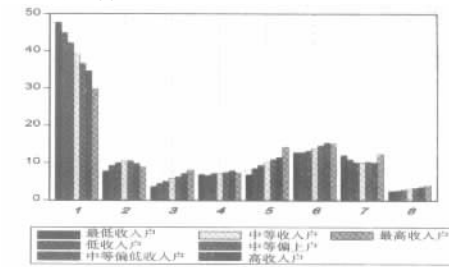


图5 200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构成比例按收入等级比较图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4年。

第二，我国经济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转折点，生命经济为此转折提供了新的模式。前面的分析表明，我国城镇地区家庭已经满足了基本生存需求，视角开始转向更高的层次，如果不能及时调整，经济中已存在的供需结构失衡问题会愈加严重。具体而言，现阶段应着重发展以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生命质量”需求的产业——生态农业、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

参考文献：

[1]黄有光. 福利经济学[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社, 1991.
 [2]Bruno S. Frey, Alois Stutzer. Maximising Happiness? [J]. German Economic Review, 2000, Vd. 1, No. 2 (May), pp: 145-167.
 [3]Michael J. Wolf. " Hedonomics": The Fun—Focused Consumer[N]. Brandweek, 2000, December 13.
 [4]黄有光. 效率、公平和公共政策: 扩大公共支出势在必行[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5]Bruno S. Frey, Alois Stutzer. What Are the Sources of Happiness?[M].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of Linz Working Paper, 2000, No. 0027 (November).
 [6]封展旗, 杨同卫. 第四次浪潮: 生物经济[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
 [7]B·约瑟夫·派恩, 詹姆斯·H·吉尔摩. 体验经济[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封明